



# 基督教文字传媒 与中国近代社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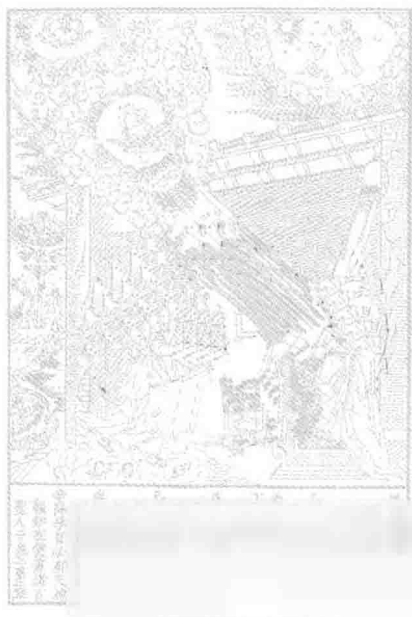
丙

李灵 陈建明 主编

甲天神聚會 王前  
恭聞降生之旨嘉  
俾尼爾尊神受命  
下界報知 聖母  
乙嘉俾尼爾降世藉  
氣顯像  
丙從天雲光照聖母  
丁聖母居宮社今現存  
極西老勳愛郡  
戊天神朝聖母傳上  
主之旨聖母受命  
天主費啟上海  
己造物主初生人類  
與降孕之期先後  
同日  
庚天主受難救世之  
期亦先後同日  
辛降孕日必有天神  
報知在靈薄諸右  
聖人云卷一第壹章

# 基督教文字传媒 与中国近代社会

李灵 陈建明 主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基督教文字传媒与中国近代社会/李灵,陈建明主编.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ISBN 978-7-208-11868-3

I. ①基… II. ①李…②陈… III. ①基督教—出版事业—中国—近代—文集 IV. ①B979.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58827号

责任编辑 李卫  
封面装帧 张志全

基督教文字传媒与中国近代社会

李灵 陈建明 主编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常熟市新骅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20×1000 1/16 印张 34.75 插页 2 字数 598,000

2013年11月第1版 2013年1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08-11868-3/B·1029

定价 68.00元

## 文字事工,功在事外(序)

回首历史,中外文化交流似乎都与“宗教”有关。佛教自西汉时便经“丝绸之路”从中亚逐渐传入中原。历经几个世纪磨合,佛教逐渐融入了中华文化而成为中华文明的一个组成部分。

公元7世纪中叶,大批波斯和阿拉伯商人经海路和陆路来到中国的广州、泉州等沿海城市以及内地的长安、开封等地定居。公元13世纪,蒙古军队西征,西域人大批迁入中国,吸收汉、蒙古、维吾尔等民族成分,逐渐形成了一个统一的民族——回族。他们虽然居住分布很广,全国各个省市几乎都有回民聚集地,但是他们由信仰形成的生活习俗和文化价值却“自成一体”,不像佛教那样“入乡随俗”完全融入到汉民族的文化中。

基督教进入中国影响比较大的当数十六世纪天主教来华,虽然也曾经颇得明清两个朝廷的赏识,但是终究因为天主教教义不愿与中国传统“礼仪”习俗和文化价值妥协,最终被迫中止在华宣教。但是,十七世纪的西方国家还处于与当时的中国相同的历史发展阶段:都处于封建制度,基本上还是农业经济为主辅之以手工业等。所以,天主教神父背后并没有绝对强势的国家力量在支撑着他们来华宣教。“话不投机”的结果也就一拍两散,中国的国家主权没有受到伤害。

十九世纪初西方宣教士来华宣教是经过十六世纪马丁·路德改教后的基督教“新教”。“新教”原本应该比以前的天主教更不具有“政治色彩”,尤其是到了十九世纪,西方诸国基本上都已经实行了“政教分离”原则,宗教已经远离政治。而且因为没有统一的教廷,“新教”形成了许多宗派,“宣教”基本上由各宗派自行其是,互相间不仅少有合作,还常因神学观念的不同而彼此争执。可随着十六世纪“宗教改革”、“地理大发现”、“文艺复兴”而来的是思想解放运动和政治革命。欧洲工业“革命”后加快了“商品输出”,环球航海的成功膨胀了开拓世界市场的雄心。可十九世纪的中国还依然如故,中国的国力与西方诸国之间的差距日益扩大。新教的宣教士与十六世纪来华的天主教传教士相比,除了信仰相同外,还

代表了一个新时代的“文明”。

西方列强不顾中国的主权和尊严,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强加给中国,近代史上这样的耻辱确实使中国人民世代难以忘怀。可是,新教传教士带来的新时代的“文明”对于当时还处于“沉睡”中的泱泱古国无疑是一阵新风,客观上促进了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进程。这是基督教在中国宣教与当年的佛教、伊斯兰教进入中国最大的不同。中国从那时开始无论是政治、思想、经济,甚至文化都努力朝向现代化而奋进。

我们位于美国洛杉矶的“基督教与中国研究中心”主要致力于推动基督教与中国现代化关系的研究。自从基督教“新教”传教士进入中国后,西方的现代文明究竟是怎样影响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的?中国学术界对此一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我们继与山东大学合作举办学术会议(2009年),专门研讨中西文化之本质;与台湾中原大学合作举办会议(2010年),专门研讨“现代化视野下的教会与社会”;与华东师范大学合作举办会议(2011年),专门研讨“基督教与社会公共领域”后,我们于2012年10月与四川大学宗教研究所又举办了“基督教文字传媒与近代中国社会”学术研讨会,专门研讨基督教的文字事工对近代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所产生的影响。众所周知,十九世纪的中国还没有“公共传媒”或“大众传媒”意识。政府内部一般是通过皇上的“圣旨”和官方“文牒”以及“奏章”来完成整个国家机器的上通下达。而对广大民众则是“张榜告示”。虽然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活字印刷”的国家,可是直到那时还没有采用“印刷”的方式,所有这些“圣旨”、“官牒”、“文告”都采取抄录方式。诚如陈建明教授在文章中所指出的:“重视文字工作是基督新教一个重要的特点,从马礼逊始,基督教始终把文字布道作为教会工作的重点之一。最初,文字布道基本上是以‘教化民众,传播福音’为目标,企图用文字来弥补口头直接宣教的不足,以劝信为直接目的。随着社会福音神学的兴起,中外教会参与社会的呼声越来越高,基督教文字事工不再局限于劝信的目的,它逐步同教育、医疗并列成为基督教会宣传教义、呼吁改革、参与社会的重要手段。”<sup>①</sup>宣教士们本意是为了更有利于传教,但是客观上却在认知上和实际应用上都突破了狭隘的宣教目的,大大地推动了社会的现代化进程。

此次学术会议的研讨主题吸引了相当多的学者,而且与通常学术会议不同的是:与会的学者虽然人数不足四十,却来自于不同的专业领域,哲学、社会学、

<sup>①</sup> 陈建明:《近代基督教在华西文字事工的研究思路与基本观点》,见本文集。

历史、语言学、法学、宗教、政治学等等几乎涵盖了全部人文学科。出席同一个学术会议的专业跨度如此之大在国内也是非常少见的。与会学者既有著作等身、桃李满天下的前辈,也有正在各自专业中肩负顶梁重任的中年教授,也有不少破茧而出的新一代专家,总之,几乎都是国内蜚声学术界的重量级的学者。

这本文集共收集会议的论文 37 篇。内容上围绕着基督教来华后宣教士们如何应用和推广文字传媒(包括印刷、出版),其对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和作用,以及从中外的文献资料中挖掘当时传媒出版的来龙去脉,不仅使一些被历史淹没的资料重见天日,而且还让那些被历史所忽视的文字传媒开拓者们获得了应有的肯定。还有的学者用自己的研究为我们补上了伪满政府统治时期的东北地区的传教士们的足迹。从时间上来看,这些论文所涉及的时间也几乎涵盖了从马礼逊来华直到现在这两百年的历史。我们也是按照不同的时间段来编撰整个论文集的。

在此,我要再次向四川大学宗教研究所及陈建明教授在此次会议中所表现出来的诚信合作精神深表敬意。

李 灵

2013 年 10 月 15 日于美国洛杉矶  
基督教与中国研究中心

# 目 录

文字事工,功在事外(序) .....	李 灵	1
传教士视野下的清王朝		
——《中国丛报》与中国政治研究 .....	吴义雄	1
规则与身份:从会章手册看潮汕基督徒的礼仪俗事 .....	胡卫清	18
近代东吴大学的英语教育与英文教科书的编刊 .....	邹振环	46
论马礼逊、英华书院与近代西方汉语语法研究名著之渊源		
——以 <i>Notitia Linguae Sinicae</i> (《汉语札记》)一书为中心 .....	李 真	63
在天朝营造天堂		
——略论在美所见两种基督教早期中文书籍 .....	李期耀	75
明清之际中国人对传教士中文著译活动的推动与协助 .....	伍玉西	85
伦敦会传教士艾约瑟与北京官话本《新约圣经》的出版 .....	潘 琳	97
北方藏蒙语言圣经译本考述 .....	赵晓阳	110
圣经的翻译传播特性及其教义基础 .....	王再兴	124
图像化传播与圣经受容		
——明清以来教会与反教人士的宗教版面传播 .....	吴 青	134
他山之石		
——马士曼与塞伦坡的中文印刷出版 .....	康太一	146
梁发与早期来华新教传教士的文字传教活动 .....	陈才俊	167
李提摩太的传教思想及其对广学会文字出版事业的影响 .....	陈 喆	176
基督教传媒与西方民主思想在近代中国的传播		
——以《万国公报》为中心 .....	谢 放 谢尚芸	188
晚清基督教出版与中国科技期刊发端 .....	许淳熙	207
加拿大差会在华西地区的社会文化活动		
——以华英书局传教士为中心的讨论 .....	周蜀蓉	216
19世纪传教士汉语方言小说述略 .....	宋莉华	229

早期进藏的北美人士有关康区的论著与中西文化交流(1889~1923)	赵艾东	243
近代基督教在华西文字事工的研究思路与基本观点	陈建明	250
民国山东基督教史料介绍及反思	张德明	262
政治高压与伪满基督教文字事工		
——兼及伪满官方基督教调研资料	徐炳三	273
民国元年《圣教杂志》的公民教育工作	白虹	291
关注社会、激励青年、直面人生		
《青年问题》——一部活跃在四十年代的基督教刊物	李栋	299
教会伦理与国族观念:从扫盲教材看清季民初基督教扫盲教育理念的		
变迁	周东华	308
诚静怡与二十世纪初中国的基督教文字出版事业	王晓静	325
“革命的耶稣”:一位青年基督徒的宗教思想与社会关怀		
——以张仕章文字作品为中心的考察	龙伟	350
胡致中与“黑苗”基督徒文字工作者	王贵生	371
《教务杂志》研究	陶飞亚	383
护教与宣教		
——对《真光杂志》在非基运动中对基督教歧视与压迫女性的		
回应之反思	贺璋蓉	415
天主教文字传媒研究:以德文期刊《高密通讯》(Kaomi Regions		
Korrespondenz)为中心	康志杰 赵根申	424
陈金镛与《金陵神学志》	严锡禹	435
《真光杂志》:寻索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		
——以张亦镜为中心的考察	范大明	445
近代以来在华基督教会文学事工的理念及实践	刘丽霞	486
民国时期金陵神学院的乡村文字事工		
——以《乡村教会》为中心的考察	王京强	502
基督教美术本土化的历史追寻	莫小也	515
新时代下基督教大学里的校园生活		
——以私立华中大学校办刊物为文本的考察	张永广	529
主祷文的翻译与神学	查常平	544



# 传教士视野下的清王朝

——《中国丛报》与中国政治研究

吴义雄

《中国丛报》月刊由美国传教士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等创办,于1832—1851年先后在广州、澳门、香港等地发行。《中国丛报》不是一份教会刊物,美国公理会海外传教差会并不支持其传教士耗费巨大精力来经营这份月刊,也不提供资助。但由传教士发行的《中国丛报》,仍然带有浓重的基督教色彩,为基督教在华传教事业服务是这份刊物的首要目标。它逐月报道在华传教的各种消息,展现基督教在华事业早期阶段的具体形态。它就传教士共同关心的重要问题发起讨论,其中若干关键性的讨论一度形成颇具规模的论战。基督教新教在华早期事业的很多重要文献,曾公开发表于这份刊物。这些,都是今天研究中国基督教早期历史的珍贵史料。《中国丛报》发表的非宗教类文章数量更大,涉及的范围也很广泛,几乎可以说全景式地展示了中西关系演变关键性年代的历史画卷,因而它也是研究近代史上众多问题的资料宝库。

本文不打算讨论《中国丛报》与中国基督教史的关系,因为以往学界就此问题已进行了较多的研究。本文尝试就这份刊物发表的世俗性文章,来探讨一下由传教士发行的月刊与中西关系演变的大背景有怎样的关联,而这种关联又如何体现了在具体言论背后的精神世界。笔者曾分别就《中国丛报》与中国宗教与民间信仰研究、《中国丛报》与中国历史文化研究、《中国丛报》与中国语言研究等专题发表过初步的研究成果。本文则将就《中国丛报》对当时中国政治的评论进行一些探讨。

《中国丛报》发行的时间长达20年,恰好在“鸦片战争前后”这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传教士和西方在华商人群体面临的一个共同问题,就是清政府的对外体制,以及与之联系在一起的政治、法律制度。因为这是他们寻求中国向他们的事业“开放”的主要障碍。即使在战后五口通商时期,他们依然感到未能真正实现

“自由交往”的目标，而横亘在他们与这一目标之间的仍然是清朝的政治体制。与清朝在面对“外夷”时茫然无措的情形不同，来华外国人认识到，要战胜顽固的清朝体制，首先需要了解它。他们希望了解：中国这个最庞大的帝国是如何治理的？管理这个拥有人类三分之一的人口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是怎样的？它的内部有什么矛盾与冲突？这个国家如何处理中央与地方、上层与下层、内地与边疆的关系？它的法律和司法制度有什么特点？当时西方商人和传教士的出版物，都就此发表了大量的文章进行讨论。英美商人的报纸发表的文章以较短篇的评论居多，而《中国丛报》作为一种月刊，则在时评类的文字外，刊登了较多有深度的长篇文章，具有较强的学术色彩。概括发表的相关文章集中讨论以下几个问题。

## 一、中国政制之性质

讨论中国政治，必然要界定其性质和特点。故不少论述过中国政治问题的作者，都将之作为自己的论题。在这些作品中，马儒翰的专题文章最具代表性。

马儒翰(John Robert Morrison)是马礼逊之子，他长期在中国生活，自1834年起，长期担任英国驻华商务监督机构的中文秘书，后来又在英国香港总督府任同样职务。他在中国语言的学习与研究方面具有相当造诣，这也使他在运用中文文献研究中国问题方面，具有比较明显的优长之处。他在1835年连续发表了几篇论述清朝政治体制的文章，构成了一个主体鲜明的系列。这个系列的第一篇题为《中国政府及其性质》，主要讨论中国政府的性质及其基本原则，皇权的本质，人民的政治地位，社会分层与特权阶级，最后还介绍了中国政治体制中的九品官阶制度。

马儒翰在文中认为，中国政治制度的“首要原则”，体现在“一种由严格的监视和包罗万象的责任组成”的治理人民的体系；这一体系因那种带有在“世界上其他文明政府所没有的军事专制主义”之特征的“细致的层级划分和相互之间的隶属关系而得以施行”；在政府或明或暗的特务政治的监督下，人们无法逃避这种统治。他将中国的政治结构比拟为一个“庞大的军队”，细密的官员层级就相当于军队的内部结构。<sup>①</sup>据他说，中国政府监视人民的“警察手段”经常被外国人

<sup>①</sup> J. R. Morrison,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Constitution”,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4, pp. 11—12.

赞叹不已,但其行政和司法合一的体制,却构成了一种令人生畏的压迫。不过,他认为中国政治的另一个特征是由司法体系体现出来的政治一致性与独立性的冲突。在这里,马儒翰所指的是下级对上级的隶属与服从关系,并不意味着身兼行政长官与法官之职的地方官员,在司法方面须服从上级,他的独立司法权来自君主,在审理过程中遵从“君主的直接命令”,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以下对上的服从为特征的行政体制与以独立的司法审判权为特征的司法体制之间的“相互对立”。<sup>①</sup>也许他的这种评论是以相当表浅的观察为基础的,但这也反映了他希望深入了解中国政治的意图。

马儒翰接着论述了中国的“绝对君权”。他描述了“天子”的独尊地位:在中国的政治意识形态中,皇帝是超越一切之上的,具有“最高的无限的立法和行政权力”;他的意志就是法律,他是一切法律与正义之源,“他的裁决是不可上诉的,只有他才能赐予宽恕”;“别人的所有权利均不能与他的愿望相抗衡;在他面前不可坚持要求;如果他想要推翻已有的规则和习俗,则没有什么权益能保护人们免于他的愤怒(之惩罚)”;所有行政权力均在他的掌握之下,军权和财权也是他的;“他要求全体人民为他服务的权力也是不可争议的”;他是所有宗教的教首,只有他才有权向最高的主宰致敬;他全权挑选其继承人;“简言之,整个帝国都是他的财产”;此外,他作为上天的代理人统治万邦,“整个地球都受他的支配”,他是一切权力和荣誉的源泉——这种思想,正是清朝拒绝与“外夷”谈判的原因。马儒翰还认识到,皇帝对人民的监督是《五经》、《四书》等孔、孟等圣贤的教诲所认可的。中国皇权是与父权相结合的,他在整个帝国的权威犹如父亲在家庭中的绝对权力;人民则是家庭的成员,他们必须服从家长;在这种制度下,“真正意义上的自由(liberty)是闻所未闻的,甚至迁徙的自主权(freedom)也是不完整的”;“权利和利益的不平等作为一种原则,充斥于法律和行政之中”,臣民与化外人,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主人与奴隶,长与幼,上层与下层,高贵者与卑下者,等等区别,在所有的公、私事务中均可遇见——当然,臣民的所有权威和高贵在皇权面前等若尘土。马儒翰表示,对于中国这种绝对专制政治的起源和演变的历史,还所知甚少。<sup>②</sup>他在这篇文章中还讨论了财产和地权问题,并将之与印度的情形相比较。此外,他还就中国的各种特权,和中国的九品官阶制度作了一些介绍。

<sup>①</sup> J. R. Morrison,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Constitution”,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4, p. 11.

<sup>②</sup> *Ibid.*, pp. 12—14.

马儒翰对中国政治文化的系统论述,在鸦片战争前的来华西方学者中具有代表性,在西方对华认识仍处转型状态的时期,这种讨论是很值得注意的。中外后世学者和评论家对中国传统政治的论述,很多与他的上述论点一致;而且,当时和后世学者阐述中国传统政治的语言,也与他的表述相似。虽然我们无法证明马儒翰的观点对他人有何影响,但以上所述至少可以表明,马儒翰关于中国政治制度的看法,在19世纪到20世纪的中、西方相关学术思想作品中,具有典型意义。

《中国丛报》在同一期还发表了英国商人英格利斯(Robert Inglis)阐述中国法律与政治问题的文章,他在文中也认为,“中国政治理论无疑是家长式的。皇帝是整个帝国的父亲;他的官员们是负责各省、各百户邑、十户邑的长老”;这种制度由孔夫子加以系统化,由教育加以固定,并长期实行。<sup>①</sup>另一位作者约翰斯顿(A. R. Johnston)在《论中国政制》一文中说,“中国皇帝能做其他国家的君主无法做的事”。<sup>②</sup>

在关于中国政治制度的论述方面,值得一提的还有马礼逊对叩头礼仪的评述。<sup>③</sup>马儒翰另写了一篇关于中国皇帝称号的短文,解释皇、帝、王、天子等名称的意义。他所根据的主要是清初史学家马骥的《绎史》一书。<sup>④</sup>

裨治文在介绍英国驻广州领事密迪乐(T. T. Meadows)的《中国杂记》一书时,转述了密氏关于“中华帝国之长期存在”的观点。密氏认为,中华帝国的这种长期延续性,完全是因为历代王朝在不同程度上坚持实行的一项原则,即:好的政制在于将具有才干和美德的人都提升到官方职位,予以品级和权力。他反驳所谓中国的稳定性在于以孝道治天下的观点,认为他所总结的原则可以产生三个方面的效果:其一,“这种原则的严格公平性”使缺乏才干者接受其结果,而且它为具有真才实学的人们提供了“稳固的开放性途径,故甚少出现蛊惑人心的人”;其二,“通过将聪明能干的人吸收到政府,一般来说,公共事务必定会得到有效实施”;其三,只有凭个人的素质才能获取财富和权力,这使得整个国家健康向上,从而国家繁盛。他认为这个原则是否得到实行,决定一个王朝的盛衰兴亡。

① Robert Inglis, “Notice of Modern China”,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4, p. 18.

② A. R. Johnston, “Remarks on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9, p. 13. 按:这篇文章发表于1840年5月号,从文章内容来看,这个约翰斯顿对清政府的禁烟政策和林则徐在广州查禁鸦片强烈不满,声言鸦片将继续进入中国。其文章在论述深度方面与马儒翰的文章无法比拟,这里不作更多述评。

③ 见: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pp. 374—376.

④ J. R. Morrison, “The Title of Chinese Emperors”,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2, pp. 309—310.

裨治文对此提出异议,认为所谓“具有美德和才干者”和“中华帝国的长期性”这两个说法均含义不明或不准。<sup>①</sup>

## 二、清朝行政体制

不少作者都对探讨清朝的行政体制深感兴趣,这固然因为来华西人长期面对中国政府的管理,须经常与之交涉,故有加以了解与研究之需要。

从第二篇开始,马儒翰的系列文章就集中评述清朝的行政体制。他的第二篇文章讨论的是中国政区。弄清政区划分的详情是了解中国国情的最基本要求,但据马儒翰说,由于对中国人文地理研究的缺乏,西方学术界这方面的情况了解得并不全面。他将中国疆域分为3个部分,其一是所谓“中国本土”,即通常所谓的十八行省。他根据方位分为北、东、中、西、南5个区域,对各省的名称作了一番解释,并以广东省为例,解释了省以下之道、府、州、县、厅等基层行政结构;其二是“满洲地区”,即东北,他在这部分说明了该地区以军事建制为基础的行政结构,介绍了将军、都统、副都统等官制;其三是所谓“中国殖民地”,包括蒙古、西北地区和西藏,并对各地区的基层行政区作了简述。<sup>②</sup>

马儒翰本系列的第三、四篇文章,以较长的篇幅,详细地介绍了清政府中央与地方政府的结构,各类职官,军事机构,及各自的职权,相当清晰,与实际情况基本上没有大的出入。他还专门就“北京地方政府机构”写了一篇文章,实际上是介绍太常寺、太仆寺、光禄寺、鸿胪寺、国子监、钦天监、太医院、宗人府、内务府等清廷机构。<sup>③</sup>这些介绍性的文字,也许没有特别重要的学术价值,这里亦无详加考察的必要,但在当时,基本上还是可以满足那些希望了解清朝政治体制的西方读者的需要。

英格利斯几乎同时发表了关于清朝政制的系列文章,作为对马儒翰的这些文字的补充。他的文章中,有两篇的标题分别是《现代中国札记:高级官员》和

<sup>①</sup> E. C. Bridgman, “Desultory Notes on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People of China, and on the Chinese Language”,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17, pp. 93—94.

<sup>②</sup> J. R. Morrison, “Political Division of the Chinese Empire”,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4, pp. 49—58.

<sup>③</sup> J. R. Morrison, “The Structure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Office at Peking of a Local Nature”,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4, pp. 181—189.

《现代中国札记：下级官员与差役》，就这两类官员的一些相关情况进行介绍。前者主要介绍总督、巡抚等省级官员与清廷的关系，他们相互之间的职权划分，他们的薪金及其贪渎行径。<sup>①</sup>后者主要讨论府、县等级别较低的官员，以及各级衙门的差役、官员之书吏和家人等群体。这位长期在中国经商的英国商人的写作兴趣，在于努力发掘清朝政治的阴暗面，故他的文章的主要篇幅，在于揭露这些下级官员及差役人等之腐败。他基本素材，来自于当时《邸钞》的报道、官员的奏折，以及他在广州地区对当地情况的长期观察。他在文中翻译、征引了不少中文文献。<sup>②</sup>

在马儒翰和英格利斯之后介绍清朝行政体制的文章，还有郭士立根据《大清会典》所写的长文。<sup>③</sup>裨治文也发表了关于宗人府的专题文章，他所依据的也是《大清会典》。<sup>④</sup>此外，该刊还发表了一些零散的评述或介绍。如裨治文曾著文介绍英国驻广州领事密迪乐的《中国杂记》一书，对密氏关于中国官员之薪俸的观点作了介绍。<sup>⑤</sup>他还搜集、翻译了一些关于中国官场的民谣，如：“官字两个口”，“官情如纸薄”，“大鸡不食细米”，“有错捉无错放”，“一代做官，十代做乞儿”，“生不入官门，死不入地狱”，“身在帝皇边，犹如共虎眠”，“笑骂由他笑骂，好官任我为之”，“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你莫来”，“半世功名百世冤”，“送肉上砧”，“群羊付与豺狼牧”，等等。<sup>⑥</sup>这些歌谣，从民间的、感性的角度，生动地反映了清代的政治文化。

清朝官场的一个独特的现象即捐纳制度，也引起了这些西方作者的兴趣。马礼逊根据 1832 年 10 月 11 日（道光十二年九月十八日）《京报》所载的相关文件，就这一制度进行了评述。据他说，这次开捐纳的起因，是西北平定回疆叛乱和山民起事引起的多达“3 千多万两白银”的财政亏空。此外，根据《邸钞》反映

① Robert Inglis, "Notice of Modern China, Officers Who Compose Superior Magistracy",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4, pp. 160—166.

② Ibid., pp. 214—229.

③ Charles Gutzlaff, "Ta Tsing Hwei Tien, or the Statistics of the Ta Tsing Dynasty",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12, pp. 57—69. 1834 年初，《广州纪事报》罕见地用很大的篇幅连载郭士立的《中华帝国政体》一文。见：“Constitution of the Chinese Empire”, *The Canton Register*, January—April. 该报这一年 5 月的几期还刊登《中国现在的王朝》(The Present Chinese Dynasty)一文。

④ E. C. Bridgman, "Tsong Jin Fu",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14, pp. 130—134.

⑤ E. C. Bridgman, "Desultory Notes on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People of China, and on the Chinese Language",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17, p. 93.

⑥ E. C. Bridgman, "The Character of Chinese Officers Illustrated by Selections from Chinese Proverbs",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17, pp. 355—356.

的情形,各地财政亦告匮乏,也存在开捐纳的需要。马礼逊将这种现象直称为“卖官”(sale of office)。他评论说,“这完全是一个坏制度,很多年老的买官者是闲散候补希望得到官职的人;而那些买得官职者将此仅仅当作从人民那里尽快得到回报的机会”。<sup>①</sup>关于捐纳制度,裨治文也发表了一篇专文。他将1848年11月29日(道光二十八年十一月四日)户部的一份官员开捐纳筹饷的奏折翻译发表,并在译文之前加了一段按语,谈论他对此的看法。他说:“卖官——或者毋宁说是出卖一种凭证,使持有人此后有资格做官——是中国政府目前的政策中最坏的一种”,它表明政府的岁入体系存在问题,更重要的是,“在这个民族最好的部分”看来,这一可憎的制度“鼓励施行弊政”,它使那些受过教育的、应当得到这些职位的才俊之士被拒之门外,使得那些资质低下者成为官员。在裨治文看来,一个奇怪的现象是,尽管这一制度明显错误,声名狼藉,中国人一般也公开谴责此制度,但皇帝、大臣和各级官员却毫不犹豫地予以支持;一旦开此途径,“购买者”便蜂拥而至。其结果,就使那些无德无能之辈“用他们的金钱买到通往高位的通行证,在其掩护下不受惩罚地折磨人民,将公义当作商品,允许各种恶徒毫无顾忌地牟取私利”。<sup>②</sup>这种事实,足以向西方读者表明,曾经被天主教传教士鼓吹过的清朝政治文明,存在着多么龌龊肮脏的一面。

马礼逊注意到清代官场存在的满汉问题。他发表了一篇短文,就朝廷和各省官员中,满汉官员的比例进行了分析。据他的统计,在当时清朝内阁的16名成员中,有9人是满人或蒙古人,而且为首者为满人,六部36名堂官,满汉各半;各省的总督、巡抚、将军、布政使、按察使、学政共102人,其中汉人73名,即满汉比例约为1:2。但马礼逊提醒说,“应当记住,汉族人口与蛮族人口之比,也许是二十比一或三十比一”。<sup>③</sup>

### 三、清朝政治动向

来华西方商人、传教士和外交人员关注清朝的政治动向,原因不言自明。他们关注的焦点,集中在北京的朝廷、广东地方当局、社会动乱及边疆问题几个

<sup>①</sup> Robert Morrison, “Revenue of China”,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2, pp. 430—431.

<sup>②</sup> E. C. Bridgman, “The Sale of Official Rank”,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18, p. 207.

<sup>③</sup> Robert Morrison, “Proportion of Mantchou and Chinese Officers in the Present Government of China”,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2, pp. 312—313.



方面。

北京的清朝皇室理所当然吸引了这些人的目光。道光帝的即位、去世和他的政治活动,清廷颁布的谕旨和政策,皇室成员的动向,清政府官员的具体名单,皇帝与大臣之关系,等等,都是他们所注意的对象。在这方面,《中国丛报》和其他英文报纸在报道有关消息的同时,往往还翻译一些谕令、圣训、奏折之类的文献,将其登载,以提供尽可能详细的信息。例如,关于道光皇帝的去世与咸丰皇帝的即位,该刊即先后数次译载相关文献。<sup>①</sup>郭士立(Charles Gutzlaff)就《大清皇帝圣训》,写了较长的评介文章,除对《圣训》的内容进行评论和介绍外,还对顺治、康熙和雍正皇帝的有关情况作了一些说明。<sup>②</sup>

朝廷的政治动向吸引了这些作者注意力。当时他们所能获取的相关资料中,《邸钞》无疑最有价值的。无论是《中国丛报》,还是其他英文报纸,都密切注意《邸钞》所反映的各种动向,并经常将上面重要的文件译为英文发表。根据《邸钞》和其他一些资料,这些作者往往能整理出相当系统的信息,涵盖清朝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特别是那些与西方国家、人士相关的事件和人物。例如,鸦片战争和战后时期,参与战争和谈判的中方大员,就是他们注意的对象。林则徐、伊里布、琦善、耆英等的受命、调动、被惩处等消息,都得到及时的报道。包括《中国丛报》在内的广州英文报刊,在1830年代初期就开始注意林则徐、耆英等官员的动向,可见其对中国政坛关注的程度。<sup>③</sup>

在这些作者整理出的信息中,除了重要官员的变动情况这一类外,比较引人注目的还有关于清政府的组成情况的资料。《中国丛报》发表过1835年(道光十五年)、1843年(道光二十三年)和1845年(道光二十五年)清政府的完整的官员名单。其中前两份为马儒翰提供,最后一份则为麦华陀(Walter Medhurst, Jr.)提供。马儒翰的两份名单包括皇室成员、军机处、内阁、六部、理藩院、都察院、通

<sup>①</sup> 这些文献由编者卫三畏翻译,分别刊载于: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19, pp. 165—166; 231—232; 282—287。此外,曾长期在澳门等地活动的圣若瑟书院传教士帕德罗·塞拉(Padre Serra)于1830年7月在英国皇家亚洲学会选读的题为《中国简论》的报告,亦在该刊登载。塞拉于1804—1827年在北京居住,与清朝皇室成员有过密切交往,他的报告的主题是清朝皇室,分为7个部分,就道光帝即位、皇子的等级与收入、宫廷的管理、嫔妃与宫女、海关与税收、嘉庆皇帝日常生活、雍正皇帝及其与喇嘛之关系,作简单的介绍。见: Padre Serra, “Notice of China”,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14, pp. 519—525。

<sup>②</sup> Charles Gutzlaff, “Ta Tsing Hwang Te Shing Heun”,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10, pp. 593—605。

<sup>③</sup> 如《中国丛报》1834年7月号报道了江苏巡抚林则徐作为“一位年迈的、但因其忠诚而受到皇帝尊敬的”官员,在完纳税捐问题上与道光帝之间的文书往来。见 Robert Morrison, “Keangsoo”,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2, p. 144。



政司、大理寺、翰林院、顺天府、宗人府等宫廷机构、国子监等，各省官员，包括将军、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学政、盐运使、督粮道，东北、西北地区的将军、都统，以及清朝在蒙古、西藏地区的官员等等人员的名单。其中1843年的名单甚至还有藩属国王室的名单。麦华陀的名单与之大同小异，排列顺序略有不同。1843年和1845年的两份名单是中英文对照的。这就使西方人可以更方便地了解“中华帝国”的内政情形。

除鸦片战争期间的少数几年外，《中国丛报》一直在广州出版。广州作为这个时期最为重要的中国对外通商口岸和外国人聚居地，其民俗、政情、商业、地理等方面的情形，一直是当时外国人首要的关注对象。事实上，当时西方作者笔下的“中国”，在很多情况下指的是广州—澳门这个区域。也可以说，他们对中国的认识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来自于他们在这个区域获得的地方经验。在政治上，广东地方政府的一举一动，都在这些西方人士的密切关注之下，因为这很可能与他们的切身利益相关。在《中国丛报》和其他英文报纸上发表的关于广东当局的各种消息，可谓不计其数，大量的中外交往的原始文献也刊登在这些报刊上面，这里无法、也没有必要一一述及。<sup>①</sup>

清朝的财政与军事状况，也是来华西人所重视的方面。但他们对这些方面的关注，是与对清廷和广东地方政府的状况和动态的关注结合在一起的，此不另论。

以上所述主要涉及清朝政权本身的形态。但这些来华传教士和商人还对清朝政治中的另一面深感兴趣。他们对清代中叶经常发生的社会动乱倾注了不少的注意力。

清代中叶开始十分活跃的、带有明显的反政府倾向的秘密会社问题，令他们深感兴趣。马礼逊和米怜等早期来华基督教传教士很早就注意到这些亚文化群体，也注意到清政府严加防范的政策，在他们的作品、通信中都曾予以叙述。马儒翰撰文认为，清政府不仅对大规模的政治性的秘密结社心怀恐惧，而且对那些

<sup>①</sup> 在这方面也许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丛报》在1845年发表了马礼逊1826—1827年的一组札记，集中记录了广东及全国的政情，见 Robert Morrison, “Chinese Reminiscences”,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14, pp. 156—171。值得注意的还有，该刊在1835年刊登了广东各级官员的名录，由马儒翰整理，较为完整，包括两广总督、广东巡抚的幕府，各司、道及其属员，广东各地军事官员，粤海关监督衙门，广州府及下属各县官员之名单，见 J. R. Morrison, “List of Persons Holding Office in the Province of Kwangtung”,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4, pp. 529—534。梁进德则在1843年发表了一篇评介《粤东同官录》的文章，以林则徐的条目为例，就其内容进行解释，见 Liang Tsin-the, “Yuetung Tung Kwan Lu”,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12, pp. 505—513。